

近代中國海關洋員 與美國的漢學研究

• 詹慶華

二十世紀中葉，西方漢學的發展轉型在美國最先突破，這離不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創始人費正清的領銜之功。中國海關的美籍稅務司馬士不僅畢業於哈佛大學，而且同費正清關係密切。本文試圖圍繞他們兩人的關係，來探討海關洋員對美國漢學發展的影響。

學界對中國近代傳教士等群體與國際漢學的關係已有較多關注和研究。然而，對活躍於中國近代政治外交領域近一個世紀之久的海關洋員，卻一直停留於政治經濟外交的研究領域，海關洋員與西方漢學發展的關係鮮為人知。其實，眾多海關洋員對漢學的跨國傳播作過不少貢獻，與當時西方著名漢學家的關係非常密切，直接、間接地影響着西方漢學的興起和發展。哈佛大學成為美國漢學研究的重鎮，與1880年代海關洋員等協助在這所大學開辦中文講座有着很大的關係。一戰結束後，漢學在美國逐漸脫離歐洲傳統漢學模式。到二十世紀中葉，西方漢學的發展轉型在美國最先突破，這離不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創始人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 的領銜之功。中國海關的美籍稅務司馬士 (Hosea B. Morse) 不僅畢業於哈佛大學，而且同費正清關係密切。本文試圖圍繞他們兩人的關係，來探討海關洋員對美國漢學發展的影響。

一 相同的經歷， 共同的興趣

馬士原籍美國，生於加拿大的新科舍。1874年哈佛大學畢業，和同屆同學墨賢理 (Henry F. Merrill)、客納格 (Charles C. Clarke)、司必立 (William F. Spinney) 等一起考入中國海關。馬士在上海學習漢語三年，1877年任天津海關幫辦，1878年調北京總稅務司署任職，同時兼任同文館英文教習。1879年，馬士調任中國海關倫敦辦事處幫辦，1883年回華，此後在天津、上海、北海、淡水、龍州、漢口、廣州等地任副稅務司和稅務司，還曾幫助李鴻章整頓招商局。1908年，馬士患病退休移居英國薩里郡，在那裏他作為一名學者開始了第二職業。雖然經常發病使馬士在大部分時間臥牀不起，但在後來的二十六年中，他完成了五部重要著作和大量論文，這使他作為十九世紀中英關係研究領域的主要權威而聞名於世^①。1917年馬士入籍英國，1934年於英國逝世。

在中國海關任職的哈佛大學畢業生中，馬士出版的著作最多，主要有：《中國泉幣考》(*The Currency in China*)、《中朝制度考》(*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中國公行考》(*The Gilds of China: With an Account of the Gild Merchant or Co-Hong of Canton*)、《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5-1834)》(*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太平天國紀事》(*In the Days of the Taipings*)、《中國國際貿易差額抵償之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Commercial Liabilities and Assets of China in International Trade*)、《遠東國際關係史》(*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等書。

馬士開創了近代中外關係史研究的先河，其《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三卷本，被中外學界奉為「圭臬」之作，風行於二十世紀世界許多高等學府。他本想以赫德(Robert Hart)的日記為主要參考資料撰寫一部以赫德為中心的歷史，後來因未能如願只得寫成一部中外關係史，但仍以赫德和海關制度做中心來敘述。他的書對當時和此後都產生了很大影響。有的著作在美國大學的中國學教學中一直受到重視，成為中國近代史專業的必讀課本，對美國了解中國具有很大影響。

費正清，生於美國南達科他州，中學畢業後在威斯康辛大學學習一段時間，1927年考入哈佛大學，1929年畢業後到英國牛津大學進修。在那裏，他結識了當時正在劍橋附近居住的馬士，馬士的鼓勵使他堅定了研究中國的信心。費正清選擇了中國海關

外籍稅務司制度作為博士論文研究課題。為了搜集有關資料，1932年他攜眷來華，在清華大學和燕京大學研究中國史。他一面進修漢語，一面師從著名史學家蔣廷黻，為寫博士論文做準備。在京期間，費正清曾兼任清華大學和海關專科學校的講師，主講中國海關史。1936年，費正清回到牛津大學，以〈中國海關的起源：1850-1858年〉(“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1850-1858”)論文獲得博士學位，1937年返美後任哈佛大學歷史系講師。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費正清在華盛頓美國新聞處任職，1942至1943年任美國駐重慶使館特別助理兼新聞處主任，1948年任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隨後費正清正式開始了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術生涯，形成了近現代中國研究的基本模式和框架，1954年在哈佛大學創建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在他的影響下，美國的漢學研究出現了繁榮局面，並取代歐洲成為西方中國學研究的中心^②。

作為美國現代中國學開拓者，費正清著作等身，主要分三大類：一是有關中國歷史的研究專著；二是關於介紹中國文獻的書；三是關於海關及海關洋員的專門著述和編著，如《總稅務司在北京》(*The I. G. in Peking: Letters of Robert Hart,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1868-1907*)、《赫德日記》兩冊(《步入中國清廷仕途：赫德日記[1854-1863]》[*Entering China's Service: Robert Hart's Journal, 1854-1863*]以及《赫德與中國早期現代化：赫德日記[1863-1866]》[*Robert Hart and 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 His Journals, 1863-1866*])、《馬士傳》(*H. B. Morse:*

馬士開創了近代中外關係史研究的先河，其《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三卷本，被中外學界奉為「圭臬」之作。他的著作在美國大學的中國學教學中一直受到重視。費正清1948年任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隨後開始了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術生涯，形成了近現代中國研究的基本模式和框架。在他的影響下，美國的漢學研究取代歐洲成為西方中國學研究的中心。他們都以中國海關史研究為起點開始中國學研究。

費正清通讀馬士的《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於1930年在英國結識了馬士。馬士告訴了他許多關於中國海關的情況。費正清覺得已找到了一位「精神上的祖父」。馬士一直幫助費正清，除了在有關文獻、書籍、個人信函等方面給予各種方便和指點外，還利用私人渠道通信，讓英、美、中國等地學術領袖密切關注費正清的學術進展情況。在馬士的鼓勵下，費正清選擇中國海關成立的初期歷史作為博士論文的研 究方向，開始走出邁向「中國通」的第一步。

Customs Commissioner and Historian of China) 等。這些著作有許多已譯成中文在中國出版。

從馬士與費正清的生平介紹中，可以看出許多共同特徵。兩人儘管年齡相差半百，但有着共同的背景和特殊的關係。他們都是哈佛大學的畢業生；都有在美、中、英等國的跨文化工作、學習、生活的經歷；都是著名的中國通；都與中國海關及洋員有着密切關係，並以中國海關史研究為起點開始中國學研究，著述頗豐且有相當影響力；最終都成了著名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

二 走向中國：海關洋員與費正清的漢學起步

在費正清的漢學研究起步中，馬士的影響不容忽視。1924年，已退休定居於英國的馬士回到哈佛大學參加畢業五十周年返校聯歡會，因其傑出的學術成就，母校授予其名譽文學博士學位。但他根本沒有想到的是，五年後一位對中國好奇的哈佛畢業生會踏入自己研究的領域，並且為哈佛創造了學術奇蹟。

1929年，二十二歲的費正清從哈佛大學畢業後獲得羅茲獎學金赴牛津大學進修。在穿越大西洋前往英國的旅途中，費正清通讀了馬士的《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三卷本。1930年在英國結識了馬士。費正清在回憶錄中寫道^③：

由於中國海關這個機構曾在大多數海關稅務司中激起虔誠的使命感，一個對此感到興趣的年輕的哈佛大學畢業

生無異給住在倫敦郊外坎伯萊的退隱生活增添了可喜的樂趣，馬士邀請我去訪問他。

據費正清回憶，他當時所拜見到的馬士是一位整潔而機靈的老紳士，告訴了他許多關於中國尤其是海關的情況。雖然這些知識開始時確實令費正清無法消化理解，但馬士在華期間豐富的人生閱歷，無疑令剛出校門踏入社會又從未到過中國的費正清着迷，因而他覺得：「我已找到了一位精神上的父親，或許可以說是精神上的祖父」^④。

從那以後，兩人一直保持聯繫，費正清經常去拜訪馬士，接受其指導。這位老人對費正清這個熱心於事業的美國青年產生了一種半是情感、半是理性的強烈溺愛。費正清於1931年在牛津完成論文答辯取得文學學士後，馬士在通信中已將「Fairbank先生」稱呼改為親切地直呼「約翰」(John)。馬士夫婦沒有孩子，事實上他們已經把費正清認同為家庭一員，對他進行了真誠耐心的培養。1932年費正清到了中國後，兩人繼續保持書信往來。直到1934年去世前，馬士一直幫助費正清，除了在有關文獻、書籍、個人信函等方面給予各種方便和指點外，還利用私人渠道通信，讓英、美、中國等地學術領袖密切關注費正清的學術進展情況。費正清的頻繁拜訪和一百多封來往信件表明，他們之間的這種關係在不斷加深。在馬士的不斷鼓勵下，也出於對馬士的感激，費正清決定寫一本關於中國海關稅務司制度的書獻給馬士。他選擇中國海關成立的初期歷史作為博士論文的研 究方向，開始走出邁向「中國通」

的第一步。費正清經常向馬士提問請教，將手稿和大綱寄給馬士徵求意見，也採納了馬士的許多意見^⑤。

為讓費正清更多地了解中國尤其是中國海關，方便其到中國搜集論文資料及實地考察中國海關，馬士將一些在中國海關工作的洋員及外國駐華使領館人員介紹給費正清，例如從中國海關退休回英的賀壁理(Alfred E. Hippisley)。賀壁理是一個有影響力的人物。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M. Hay) 1899年提出「門戶開放」照會中的施行條款，就是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經由稅務司賀壁理提出的。賀壁理為當時美國第一助理國務卿柔克義(William W. Rockhill) 起草了一份備忘錄，海約翰採納了這份備忘錄^⑥。這段歷史對費正清的中外關係史研究是非常有價值的。

1932年，費正清開始了第一次中國之行。經馬士介紹，他在上海會見了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署稽核科英籍稅務司魏爾特(Stanley F. Wright)。魏帶他到上海總會和「世界最長的酒吧間」共進午餐，相約而來的還有海關其他高級稅務司。1932年6月，費抵達天津訪問了美籍副稅務司史密司(Everitt Groff-Smith)。史的岳父就是與馬士同為哈佛大學1874年屆畢業生、退休前一直任上海江海關稅務司的墨賢理。史密司夫婦在天津的寬敞官邸裏歡迎費正清，還帶他參觀了自己在海關的辦公室，介紹了當時海關內部發生的一些改革情況^⑦。1932年秋天，馬士的一封信介紹費正清有機會與海關英籍總稅務司梅樂和(Frederick W. Maze)會晤。在會晤中，梅當場對費正清的研究領域表示支持，並答應此後三年為其提供便利^⑧。1933年，

北京的稅務學校聘請費正清講授海關史，每周講授二小時，主要內容是他正在考慮撰寫的學位論文^⑨。在北京任教時，馬士還從英國寄給費正清一些自己的藏書，供他參考^⑩。

1935年1月，費正清到了廣州。他走訪了美籍粵海關稅務司李度(Lester K. Little)。李度及其母親對費正清一家人的到來非常歡迎，邀請他們搬到他家住^⑪。李度帶領費正清乘坐海關遞送公文的汽船沿珠江順流而下，到達黃浦，這給費留下了深刻印象。由於費在早期通商口岸旅行中受到眾多海關洋員的熱情款待，並作長談，沿途又相繼會晤了各口岸的朋友，進一步證實了他從檔案中推出的一些觀點和想法，這些都體現於此後包括畢業論文在內的眾多論述中。

從1932年開始的中國實地調查，讓費正清直接感受通商口岸的風土人情，為自己積累了此後寫作專題論文的必備資料，並為他撰寫關於早期海關的論文和1953年出版的那本在博士論文基礎上改寫的成名作打下了基礎。從初識馬士到與眾多海關洋員的廣泛交往，對中國社會尤其是通商口岸氛圍的耳聞目睹，都為費正清變成一個「中國通」奠定了基礎。半個世紀後，他在《美國與中國》(*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一書再版序言中強調，他的中國問題研究得益於這四年在華的工作學習生活經歷。可見，如果沒有馬士和其他海關洋員的熱情幫助和引導，費正清就不可能有順利且收穫頗豐的中國之行，更談不上對中國海關及中國社會有真實的感性認識。

1935年底，費正清一家離開中國，帶着收穫回到英國，並在那裏完成了

馬士將一些在中國海關工作的洋員及外國駐華使領館人員介紹給費正清，如賀壁理、魏爾特、梅樂和等。梅更對費正清的研究領域表示支持，並答應此後三年為其提供便利。從1932年開始的中國實地調查，讓費正清直接感受通商口岸的風土人情，他的中國問題研究得益於這四年在華的工作學習生活經歷。這些都有賴馬士和其他海關洋員的熱情幫助和引導。

題為〈中國海關的起源：1850-1858年〉的博士論文，1936年通過學位考試，不久回到哈佛任教，從此走上了中國學研究的不歸路。

三 師徒傳承：新漢學的開創

費正清創立新漢學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或得益於馬士這位海關老前輩，無論從研究領域還是研究方法以及觀點等方面，無不受到馬士直接間接的啟發與影響。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余英時在〈費正清的中國研究〉一文中曾指出，有三位大師引領費正清入門從事中國研究。從費正清的回憶錄和早期著作中，我們也略知一二。第一是海關洋員馬士，第二是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⑩，第三位是時任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的蔣廷黻。馬士、拉鐵摩爾和蔣廷黻都是中外關係史的專家。在這三位大師中，對費正清漢學研究方法及理論建樹貢獻最大的仍要數哈佛大學校友、被費正清視為「精神教父」的馬士。

不可否認，蔣廷黻是費正清在清華大學期間的指導老師，一位對他「發生了定型作用的史學家」^⑪，費也曾認為蔣是領他進入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老師。蔣廷黻是當時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主要開拓者之一，但他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卻深受早期西方學者的影響。蔣的主要觀點和分析模式與馬士的著述十分相似。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是以中國外交為主要線索研究中國近代史，認為近代中國史是一部外交史和歐化史，以中國的西化

程度作為標準，把中國近代史劃分為中外「衝突時期」(the Period of Conflict 1834-1860)、中國「屈從時期」(the Period of Submission 1861-1893)及「被制服時期」(the Period of Subjection 1894-1912)。馬士於1910、1918年出版的《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三卷本都早於蔣廷黻1935年出版的中國近代史專著。蔣廷黻的解釋模式很大程度上受到馬士等人的影響。有學者發現，在關於中國近代史的體系架構、敘事方式和解釋思路上，蔣完全接受了馬士等人的觀點^⑫。如果蔣廷黻對費正清的中國史觀有所影響，較大程度是將馬士的成果間接地傳播給後者。

可見，馬士對費正清的漢學影響有兩種途徑：一是其研究方法和觀點直接影響後者，馬士的《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是費正清最早接觸的中國近代現代史專著，費在中國問題方面的許多觀點也與馬士如出一轍，甚至直到近年仍有中國學者認為「費正清教授的基本觀點未能脫出馬士的窠臼」^⑬；二是通過蔣等人間接影響。費正清在中國現代化進程分析中提出的「衝擊—回應」理論是其傳承馬士研究成果的有力見證，費創建完善的以「西方為中心」的「外向型」分析模式在美國現代中國學領域曾長期佔據統治地位，曾一度成為「學術規範」。

在研究視野和方法上，馬士對費正清的影響同樣不少。馬士的著作將中國歷史研究延伸到當代(即馬士在華工作的年代)，分析時尤其注重檔案資料，強調細節論述。這些特點在費早期著作中都能找到。如費氏研究鴉片戰爭後條約體制的建立，採取的自然不是中國的觀點，但也不能說是「帝國主義的觀點」。事實上，他是盡

馬士對費正清的漢學影響有兩種途徑：一是其研究方法和觀點直接影響後者。費在中國問題方面的許多觀點也與馬士如出一轍，甚至有學者認為費的基本觀點未能脫出馬士的窠臼；二是通過深受馬士影響的蔣廷黻等人間接影響。費正清在中國現代化進程分析中提出的「衝擊—回應」理論是其傳承馬士研究成果的有力見證。

量以冷眼旁觀的態度來處理這一段歷史，我們不妨說其立場是一種客觀主義，或現實主義^⑩。這一點與馬士等海關洋員著作中的觀點是相同的，他們力求克服用「歐洲中心觀」看待中國歷史，但都沒有徹底脫離「西方中心觀」的局限。

在寫作風格上，費的《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一書中那種對歷史細節的詳盡描述近乎馬士寫作風格的再現。與馬士利用英國外交檔案作為研究資料有所不同的是，費正清開啟了使用中國歷史檔案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新風。當他1932年來中國時，故宮大內的檔案剛剛開放，費正清顯然是最早使用這些檔案的學者(或外國學者)之一。使用中國檔案研究中國歷史成為費正清的一個學術規範^⑪，其目的是為了「突破馬士那種只依靠西方原始資料搞研究的局限」^⑫。

費正清對馬士漢學成就和學術貢獻的推崇備至反映了兩者的傳承關係。費在臨終前幾年寫的《馬士傳》序言中談到^⑬：

馬士對我們理解現代中西關係的貢獻是基於他的海關工作經歷和歷史性的研究成果，……他的中國歷史著作盡量避免了那個時期條約口岸西方群體中明顯的沙文主義，他堅持審慎、公正正確陳述歷史事實，這對我和其他新手來說，他為我們微不足道的成績提供了堅實基礎。

1934年，費正清在北京寄給馬士的信中曾借用燕京大學王克私(Philippe de Vargas)教授非常肯定的語氣說：「單憑《關係史》一書就足以把你(指馬士)

定位在獨一無二的大師級水準，而其他人很難達到」^⑭。費正清以中國海關這個特殊的機構作為研究起點就源於此書^⑮。費正清在其《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一書序文中明確指出，自己的許多研究成果都是在馬士的基礎之上所作的局部補充^⑯。費正清十分讚揚馬士的謙遜品格、堅韌的治學精神和樂於公開所使用的新材料和新解釋^⑰。因此，費正清為何把馬士尊稱為「師祖」和中國問題「歷史學家」，也就不難理解了^⑱。費正清與馬士的師承關係演繹了一段感人的學術傳承佳話。1931年費正清許諾要寫一本關於馬士的傳記獻給這位啟蒙和引路的前輩^⑲。1934年1月馬士在英國去世，費正清為其撰寫了個人傳略登載在2月25日《北平記事報》上^⑳，一則出於對這位中國學啟蒙老師的緬懷，二則為了感激馬士對他一直給予的殷切關心。費正清成名之後在哈佛大學培養漢學研究人員時，要求他的博士生必須閱讀馬士的專著^㉑。

1995年，費正清門徒劉廣京的學生、美國賴斯大學教授司馬富(Richard J. Smith)曾對馬士、費正清兩人的學術淵源作過全面分析比較，其中寫到^㉒：

費絕不是老師思想的克隆者，但是他們確實在西方對中國的影響方面有共同的成見。……馬士對費正清學術生涯的影響比其他任何人要多、要大，費後來從事研究近六十年，完成了五十七部書，一百四十多篇論文和更多的書評，與他的良師(馬士)一樣，費正清在學術研究中思路清晰，論證徹底，觀點客觀。

這從晚輩眼裏透視出馬士與費正清在漢學研究領域的學術傳承關係。

費正清指出自己的許多研究成果都是在馬士的基礎之上所作的局部補充。他十分讚揚馬士的謙遜品格和堅韌的治學精神，尊稱其為「師祖」和中國問題「歷史學家」。費正清與馬士的師承關係演繹了一段感人的學術傳承佳話。1931年費正清許諾要寫一本關於馬士的傳記獻給這位啟蒙和引路的前輩，又要求他在哈佛的博士生必須閱讀馬士的專著。

四 海關洋員與美國的漢學發展

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進入美國史學主流，費正清無疑起了關鍵作用。他在哈佛大學開闢了中國歷史研究新園地，並把這塊園地耕耘得欣欣向榮，更由於他倡導以社會科學研究現代中國，哈佛的政治系、經濟系和社會系也在他積極推動下先後增設了關於中國問題的專題講座。他以哈佛為基地推廣中國近代現代史研究，培養了大批專家，幾乎美國各主要大學的中國問題研究和教學都有他的博士生畢業，美國三代中國問題學者都曾受到他的惠賜²⁹。

中國海關洋員對美國漢學發展的促進作用主要基於當時哈佛大學與中國海關的特殊關係。從赫德任總稅務司開始，就招聘過不少哈佛大學畢業生。他們在海關都表現出色，曾被稱為「最佳的公務員」³⁰，有的為母校聘請中文教授（戈鯤化）開設漢文課程作了大量工作，有的引導哈佛畢業生費正清研究中國問題，都體現出對哈佛大學漢學的貢獻。赫德去世後，哈佛大學畢業的海關稅務司墨賢理等提議設立了赫德銅像，當時哈佛大學校長愛理鶚（Charles W. Elliot）專題了銘文³¹，刻在銅像側面，對赫德作了高度頌揚。費正清領導下的一些哈佛學者還組織編輯了《赫德日記》、《總稅務司在北京》、《馬士傳》等與海關洋員有關的資料和專著，並從事着相關的學術研究。哈佛大學圖書館至今還珍藏着中國海關洋員的許多個人資料和海關出版物，這些在某種程度上寄託了哈佛大學對從該校畢業的海關洋員最恰當和最珍貴紀念。

費正清漢學研究從起點到終點都

與中國近代海關及其洋員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除了他的博士論文以中國近代海關起源為選題外，他對中國近代海關制度的奠基人赫德推崇備至。中國海關及其總稅務司赫德幾成費正清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起點和終點，「赫德產業」成了這位「美國中國學方面最大的學術企業家」的招牌之一³²，伴隨其學術生涯。在費正清全身心經營「赫德產業」的過程中，有兩項核心內容值得提及，一是赫德與金登幹（James D. Campbell）的往來函電，二是《赫德日記》的整理出版。從廣義上講，「赫德產業」還包括了中國海關及其洋員在內的相關問題研究。這些足以構成他創辦的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研究特色。

費正清還不忘鼓勵後學研究赫德。據哈佛大學出版社編輯布諾納（Katherine F. Bruner）回憶³³：

約翰（即費正清）以他那慣常的慷慨建議我寫一本有關這個家庭的書，他將把它寄給我出版社的編輯。後來雖然我確實寫了這本書，而且編輯也寫來了一封加以稱讚的信，但是它從未出版。然而這一事實本身就是費正清願意推進知識增長和鼓勵同事的又一個體現，……後來我繼續和他一起編輯了關於羅伯特·赫德爵士的另外兩本書，而且更好地了解了作為偉大的學者和熱情敏感的朋友的約翰。

紐約塞維利大學教授鄭應還追憶道³⁴：

是費正清，使我對羅伯特·赫德產生興趣，也是他幫我選了論文的題目。他讓我使用他辦公室裏的中國郵政地圖集，以便找出古代的郵政體系——驛站的分布路線。

中國海關洋員對美國漢學發展的促進作用主要基於當時哈佛大學與中國海關的特殊關係。從赫德任總稅務司開始，就招聘過不少哈佛大學畢業生。他們在海關都表現出色，曾被稱為「最佳的公務員」。費正清領導下的一些哈佛學者編輯了《赫德日記》、《總稅務司在北京》、《馬士傳》等與海關洋員有關的資料和專著。哈佛大學圖書館至今還珍藏着中國海關洋員的許多個人資料和海關出版物。而赫德是費正清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起點和終點。

即使在晚年，費正清對赫德的研究，依然是其從事中國問題研究的關注重點。1990年有位朋友去拜訪他，儘管費正清當時已患有心臟病，但一直還在為尋找赫德的家信而努力着，即使到了開飯的時間，因為探討赫德的往事，用餐也得往後拖。正如這位朋友所說：「相比有關羅伯特·赫德爵士的問題，其他任何事，包括我的晚飯和你的拜訪，都只能等一等了。」^⑤據他的學生、加州大學教授徐中約回憶，費正清的工作時間表，也有些「赫德化」了^⑥：

上午，他在課堂裏，或在溫德納圖書館瀏覽學習。中午，一般他來到研究中心，和朋友、來訪者、職員們一起共進午餐；下午，稍事休息之後——李鴻章式的著名的午間小睡之後——他口授備忘錄，回覆源源不斷的郵件，接見研究員和訪問學者，或者主持會議、研究班、討論會。他很少在六點之前離去。

這與赫德在海關的工作習慣十分相似。

1980年代以後，隨着中國大陸海關史研究的興起，費正清與美國其他漢學研究人員，加強了與中國學界的交流聯繫，雙方共同探討中國海關歷史及海關洋員尤其是赫德的活動。如費正清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審陳霞飛、中國海關史研究中心主任陳詩啟等都有通信聯繫，他們互贈《總稅務司在北京》、《赫德日記》、《馬士傳》、《中國海關密檔：赫德、金登幹函電匯編》等書籍^⑦，促成兩次（1988年香港、1990年廈門）中國海關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召開。儘管跨洋

的交流在觀點上存在分歧，但雙方都能心平氣和、從歷史資料出發研究歷史，體現出超越意識形態分歧進行交流的良好願望。費正清不僅向美國文化機構推薦中國大陸學者整理出版的《中國海關密檔》，而且退休後還不斷向中國史學界推介美國學者，為拓展中美學界的交流做了大量工作。孔飛力(Philip A. Kuhn)、司馬富等在他的推薦下曾專訪廈門大學中國海關研究中心，後者還在該校開設過關於赫德的學術報告，還曾撰寫關於赫德的論文，先後參加過三次中國海關史國際學術研討會^⑧，這些都「將給超越重洋的學術界的攜手合作樹立榜樣」^⑨。1991年，獲悉費正清去世消息時，學界無不表示對這位史學泰斗的懷念。中國海關史研究中心原主任陳詩啟在電傳中寫道^⑩：

驚悉費正清教授逝世，不勝悲痛。這是世界歷史學界的重大損失，也是中國海關史研究的重大損失。……費正清教授是中國海關史研究的先輩。多年來，他對我們中國海關史研究中心的工作極表關懷。

雖然美國的一代中國學宗師走了，但慶幸的是，他未完成的宿願——六十四年前許諾撰寫有關馬士的傳記，終於由其後學在1995年整理出版。

儘管中國近代海關已成過去，海關洋員也已退出歷史舞台，但圍繞着他們進行的各種研究仍在中外學界延續着。在全球化的形勢下，海關洋員對西方漢學發展以及跨文化傳播的影響，絕不止於他們生活的那個時代，也不限於馬士和費正清之間的學術傳承關係。

1980年代以後，隨着中國大陸海關史研究的興起，費正清與美國其他漢學研究人員，加強了與中國學界的交流聯繫，雙方共同探討中國海關歷史及海關洋員尤其是赫德的活動。費正清不僅向美國文化機構推薦中國大陸學者整理出版的《中國海關密檔》，還不斷向中國史學界推介美國學者，為拓展中美學界的交流做了大量工作。

註釋

①⑧⑩⑫⑭ 埃文斯 (Paul M. Evans) 著，陳同等譯：《費正清看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頁13；27；15；36；14。

② 元青等著，李喜所主編：《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四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頁157-58。

③④⑥⑦⑨⑪⑬ 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 著，陸惠勤等譯：《費正清對華回憶錄》(上海：知識出版社，1991)，頁22；22；180-81；48；117-18；21；153。

⑤⑩⑬ John K. Fairbank, Martha H. Coolidge, Richard J. Smith, *H. B. Morse: Customs Commissioner and Historian of China*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5), 235; 236; 235, 237.

① 這裏的「費正清一家」是指夫婦倆和其妻妹共三人。

⑫ 拉鐵摩爾 (Owen Lattimore)，美國東方學家，能說北京話和蒙古語，著有《滿州的蒙古人》(*The Mongols of Manchuria, Their Tribal Division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Historical Relations with Manchus and Chinese, and Present Political Problems*)、《現代中國的形勢》(*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A Short History*)、《亞洲的局勢》(*The Situation in Asia*)等書。在歐美漢學界中享有「蒙古通」之名。

⑬⑭ 余英時：〈費正清的中國研究〉，載傅偉勳、周陽山主編：《西方漢學家論中國》(台北：正中書局，1993)，頁4；7。

⑮ 歐陽軍喜：〈蔣廷黻與中國近代史研究二題〉，《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2期，頁88-94。

⑯ 陳霞飛：〈越過重洋的追悼——記在一個研究項目中與費正清教授的文字交往〉，《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頁210。

⑰ 陶文釗：〈費正清與美國的中國學〉，載陶文釗、陳永祥主編：《中美文化交流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頁148-67。

⑱ John K. Fairbank, introduction to *H. B. Morse: Customs Commissioner and Historian of China*.

⑳㉑ Richard J. Smith, preface to *H. B. Morse: Customs Commissioner and Historian of China*.

㉒ 馬士 (Hosea B. Morse) 著，張滙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北京：三聯書店，1957)，中譯本序言。

㉓㉔㉕㉖㉗㉘ 柯文 (Paul A. Cohen) 等編，朱政惠等譯：《費正清的中國世界——同時代人的回憶》(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0)，頁72-73；42；209；81；122；40；199。

㉙ 魏爾特 (Stanley F. Wright) 著，陳養才等譯：《赫德與中國海關》，上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7)，頁362。

㉚ 銘文內容是：「中國海關總稅務司，中國航海燈塔機構的創始人，國家郵政局的組織者和管理人，中國政府信賴的顧問，中國人民真正的朋友，爾雅、雍容、睿智而堅毅，他歷盡艱難困苦，為中國和世界完成了一項偉大的事業。」參見《赫德與中國海關》，下冊，頁573-74。對海關洋員赫德作如此評價，拙文認為不盡正確，這只代表當時西方人士的一種觀點。

㉛ 「赫德產業」是費正清學生布諾納之語。美國著名東亞問題專家斯卡拉皮諾 (Robert Scalapino) 稱費正清是「美國中國學方面最大的學術企業家」。

㉜ 《中國海關密檔》共九卷，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會同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譯，主要內容就是赫德、金登幹兩人函電的匯編，與《總稅務司在北京》一書只收錄赫德致金登幹的書簡不同的是，該書共收入3,528封往來信件和大量電報稿。

㉝㉞ 陳詩啟：〈沉痛哀悼費正清教授〉(1991年11月10日電傳手稿複印件)。

詹慶華 中國近現代史(海關史)博士，在上海海關從事加工貿易監管工作，業餘參與海關歷史及現行保稅政策研究。